

# 湘籍留日学生与湖南近代教育发展

张祚崑 朱小宝<sup>1</sup>

**【摘要】**湘籍留日学生作为湖南近代史上一个特殊政学群体，为发展湖南的近代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建设近代的新式学堂到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从开辟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道路到促进湖南的社会启蒙等，湘籍留日学生都是中坚或重要力量，建构了湖南近代教育发展的雏形，为全国近代教育的兴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

**【关键词】**留日学生 近代湖南 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0)00-0247-07

近代留学事业的勃兴，是中国近代教育变革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一直处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阶段，亟须新知识的输入和新秩序的建立。而留学事业的兴起至少在新式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新思维的养成方面，为上述两个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必备的基础和准备。湘籍留日学生作为湖南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政学群体，为近代湖南社会、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就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目前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只是仍有待深入。本文即以探讨湘籍留日学生与湖南近代教育发展关系问题为切入点，进一步对湘籍留日学生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进行深入讨论，并尝试对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路径展开反思与总结。

## 一、清末湖南留日风潮的兴起

中国学生正式出国留学的历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即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而后，由于当时洋务派发展近代海军和陆军的需要，1875年，清政府再次派出赴欧军事留学生。纵观这两次官派留学生的情况，可看出这两批遣欧美留洋的学生，其质量参差不齐，虽然出现了詹天佑、邓世昌等著名人物，但其中大多数归国后，即淹史迹。究其原因，最为关键的则在于这两次留洋的初衷：只为挽救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使留学生所学至为功利且浅薄；且所学内容多涉及实际的技术和军事战法等实用的方面，缺少文化义理等方面知识的涉猎。这就使此两次留学难以影响甚至改变国内的教育体制和环境。

当然，外部事件的刺激往往会使事物发生某种质变。1895年日本战胜清政府，夺得了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这样的结果，使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们广泛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在短短三十年内完成自强事业，即因为其虚心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所致。如戴季陶、蒋百里所著《日本人日本论》一书中曾言：“……(日本)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sup>[1](p28)</sup>虽然这些看法似乎有些表面，但亦证明了日本“自强运动”的成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促导下，当时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这种学习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明治后日本政府所制定的留学政策。

正如张之洞所言：“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旨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sup>[2](p179-180)</sup>换言之，在其看来，如果当时中国可以如日本一样，积极向西方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理念，即可使中国摆脱忧患局面。而且在张看来，这种直接学习的方式亦可达到“速成西学”的目的，所谓“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四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从帝制到共和转型期传统政治精英的处境与抉择——以徐世昌为中心的研究”（18YJA770006）

**作者简介：**张祚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朱小宝，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湖南长沙 410081）

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sup>[2] (P179-180)</sup>，即指此意。

因此，师法日本、留学救国，便成了当时国内一些先进人士的必然选择。加之中日间路程、语言再到风俗方面的相近，遂使当时国内对于去日本留学颇为独钟。如胡汉民在回忆录中言：“是时留日学生约二万余人，以其地去中国近，文字易通，以同为亚洲民族，而倒幕后维新变法，遂臻富强，则多慕之。”<sup>[3] (p18)</sup>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中，对此表述得更为具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sup>[2] (P179-180)</sup>总之，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近代中国学生留日的大幕就此拉开。

而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湖南省，亦再次翘立于此次留学日本的风潮之上。张朋园曾评价说：“湖南敢为当时中国之先，是历史的选择，亦是当时湖南人心中那份家国情怀所致的。”<sup>[4]</sup>从 1840 年开始，近代湖南省先后涌现了魏源这样的经世派思想家，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这样的洋务派干臣，更有毛泽东这样的伟人诞生于此。除此之外，在中国近代，多起重大历史事件中亦有众多的湖南人参与，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特别是在 1895 年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的情况下，谭嗣同、唐才常等先后积极倡导变法，其中不少人对日本如何实现国家的强盛问题十分关注，如谭嗣同即曾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对此问题的看法。其中颇为显著的看法，便是提出了应大力鼓动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其“速强之法”。此种论调，促成了湖南思想先进人士积极赴日学习的心理，成为其能够在后来多赴日本留学的主要原因，更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湖南此时所涌现出的留日学生，更是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未来中国的教育面貌，成为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的急先锋。

关于湘籍学生赴日留学的时间，可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1897 年至 1898 年，《湘学报》和《湘报》开始刊载关于日本的社会和教育方面的文章<sup>[5]</sup>，如《湘学报》第 21 册载江标的《日本华族女校规则文》，第 28 册起刊载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湘报》第 118 号至 123 号刊载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等，都为湖南籍学生留学日本做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其一，非官方派遣留日学生的开始。因 1898 年 6 月戊戌政变的发生，从长沙时务学堂选派的 70 名学生未能如期赴日。

直到 1899 年，范源濂、秦力山等 11 人才启程留学日本，正式开启了近代湖南学生留学日本的历史帷幕。而地方上如湘潭袁树勋等 4 人筹款，派遣师范生 4 人赴日留学；陶思曾夫人郑家佩自费出国赴日，此举亦开启了湖南女性留学的滥觞。其二，官方派遣留学时间。1902 年湖南巡抚派遣俞洁庆、龙纪官等 12 人赴日留学，为期 6 个月，主要学习速成师范科。这开创了湖南官费留日的开始。1905 年，端方派遣 20 名女留学生赴日，亦使官费女学生留日成为官方的常态留学政策。

关于湘籍学生赴日留学的数量。《湖南同乡留学日本提名》和《湖南同乡留学日本提名补录》<sup>[6] (p35)</sup>中显示，自 1899 年到 1903 年，湖南籍留日学生数量从 11 人增加至 106 人，仅官费生即达到 32 人，到 1906 年，这一数量已经达到了 99 人。而《中国人留学日本史》<sup>[7] (p566)</sup>和《湖南教育史》<sup>[8] (p259)</sup>两部书中显示，到 1906 年，湘籍留日学生数量已增加至 589 人。根据《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sup>[9] (p375)</sup>湖南留日学生自 1907 年至 1911 年，官费学生共毕业 162 人，自费学生共毕业 97 人。自 1899 年至 1911 年，除去目前相关统计缺失的情况，保守估计当时的湖南留日学生数量应在 2000 人左右。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当时留学日本的湖南学生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当然，这样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亦注定有重要和深远的贡献。

## 二、湘籍留日学生对湖南近代教育的贡献

教育为国家发展之本，关系其发展的各个层面。所以，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对改造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精神十分重视，湘籍留日学生也不例外。从其群体学成回湘后的表现来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概括：其一，传播新式教育思想及促进新式教育改革；其二，在湘参与创办各类新式学校，以培养新式人才。

## （一）传播新式教育思想及促进新式教育改革

传播新式教育思想及促进新式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建构教育理论、编写教科书和推动制定实施有效的教育政策三个侧面。

1. 建构新式教育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建构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基础即在于传播西方及日本的先进教育思想，倡导国民教育。众所周知，中国当时的教育理念是在旧的儒学系统中逐步形成的。由于儒学系统中不分科、重意念的特点，客观上阻碍了近代中国的科学及工艺技术的发展。因此，传播国外先进科学理念及教育思想，推动普遍近似于完整形态的国民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1902年，杨毓麟、黄兴、梁焕彝等创办《游学译编》杂志，“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sup>[6] (P46)</sup>，积极传播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教导民众应破除目前的旧思维，跟随世界先进潮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该杂志一经刊发，便受到社会的广为关注，黄兴等倡议将其扩大为“湖南编译社”，并陆续组织编译了《美国教育制度》和《教育学》两部西方教育书籍，一度成为当时研究西方教育的指导性书籍，对推动湖南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大影响。

胡元谈等提倡国民教育理念，组织编写了《日本普通学科教授细目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从分科教学论的角度，对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进行论述。总之，在这一时期，教学分科论、新教育学、实验法等西方教育思想陆续传入湖南，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新式教育的发展，影响了一大批三湘学子投身救国救亡的历史使命中，为后续湖南一系列革命风潮和社会变革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 编写新式教科书。教科书作为教学最基本工具和素材，其编写的质量和思想内容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影响。前文提到的“湖南编译社”编写了《史学原论》《国家学》等书籍，作为新式学堂的课用教材；同时，“湖南编译社”还在这一时期开始试验编写相关理工科目的书籍作为教材，较为典型的如《中等物理教科书》和《中等化学教科书》等书籍；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的何炳麟编著的《几何图学教科书》，在当时长沙的各中等和高等学校中广泛使用，此书后被称为“湖南制图学教学的开山祖”<sup>[10] (P72)</sup>。

这些教科书虽然在内容方面较为粗浅，在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结构错位，但作为首开湖南新式教科书编写而言，其作用和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对于当时较为封闭落后的湖南教育环境来说，这些教科书样式新颖，内容排版清晰，在湖南地方社会收到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同时也为之后的新式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促进湖南义务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政策本身是为某种教育形式提供必需的载体和物力或智力资源先导性力量。留日学生因受到日本近代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影响，深知正确的教育政策对推动新式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在推动湖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教育政策的制订，以期达到促进教育改革的目的，在这个时期，留日学生主要在湖南倡导实行义务教育，以期建设湖南新式教育的实施基础。

1903年，参与第一批赴日学生团体的俞诒庆等就上书湖南巡抚俞廉三，希望可以在湖南实行全民性质的“义务教育”，称：“不知教育者无立国之道，不知国民教育者无所以立国之道，不知强迫教育者无实行国民教育之道。”<sup>[5]</sup>蔡锷亦在此时提出：“要救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普及现代教育。”“如果我国同胞都具有现代文明素养，懂得爱国，知道怎样爱国，知道怎样维护和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以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不愁不富强了。”<sup>[11] (p30)</sup>在留日学生的积极奔走和倡导之下，湖南巡抚俞廉三于1903年发文称：“自六岁至十四岁，谓之学龄，有不入学者罚其父母，谓之强制教育。”“苟非多建初等小学，则升选无资，根基不立，欲教育之普及，其道无由。”<sup>[12]</sup>这是湖南第一个明确的推动义务教育的政策，同时也因此而开全国风气之先，给当时艰难起步的湖南新式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展空间，对提高当时湖南人的教育程度和民众识字率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二）参与创办各类新式学校

新式学校是实践新式教育思想的必要载体,从整个湖南新式教育的实施效果来看,此为湘籍留日学生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如范源濂、黄兴和胡元谈等于1903年创办明德学堂,这是湖南第一所传播西方先进教育思想,按照新教育形式创办的私立学堂,并陆续培养出陈果夫、蒋廷黻等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著名人物,为此,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曾说:“今观宣劳党国之同志,出于明德者甚众。”<sup>[8] (p200)</sup>此后,湖南省各类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长沙、衡阳等地。若按其主要类别划分,这些留日学生主要参与创办了以下几类新式学校。

1. 创办新式中、小学校。在湖南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是新式教育建立的基础。近代湖南中学堂的设立过程较为顺利,从1905年由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设立西路、中路和南路3所中学堂开始,至宣统年间,共设立中学堂47所。但这一数量并不能满足当时近200万湖南青少年的教育需求。所以,在这期间较为著名并主要肩负起新式教育重任的中学堂则为私立学堂,主办这些私立学堂的主要人物大多数为留日学生,如黄兴、张继和胡元谈等于1903年创办的明德学堂,其主要师资力量也为留日学生;同年,胡元谈等再办正经学堂,其教学中提倡用中西兼容的方式进行授课;再如,禹之谟等于1904年创办惟一学堂等。

这些中学堂的创办有效弥补了清政府设立新式学堂数量的不足,同时,这些学堂所设置的课程和采用的教学方法等都几乎参照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为当时的湖南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如任弼时、周小舟和金岳霖等,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深远。小学堂的创办起于1905年,至1906年,湖南地区共设立官办小学堂83所。但同样存在需求远大于供给的现象,因此,留日学生所创办的私立小学堂再一次发挥作用。1904年,胡元谈、龙漳等创立经正学堂,设小学堂两班;1906年,陈润霖等创设楚怡学堂,专办小学教育等。虽然较之中学堂的设立数量和办学质量,小学堂在这两个方面的确不能与之相比,但由于这些留日学生热心推动小学堂的设立,对引领后来社会关注小学堂建设的热潮,有着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2. 建立职业类教育学堂。湖南近代的职业教育初为官办,早在陈宝箴时期,其就在计划设立隶属于农工局和工务局的职业学校各一所,但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只能暂时搁置。至1905年,端方有感于之前的农工艺学堂设施简陋,且管理混乱,因此,他在此基础上设立艺徒学堂,后经商议,将其升为中学堂级别。至1910年,已开办金工和图绘科目,招收学员160人,初具规模。连同之前设立的农务学堂和实业学堂,此时湖南的职业教育已经基本成型。

但随着新政规模的不断扩大,官办职业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因此,留日学生朱剑凡、龙漳、谭延闿、徐特立等人开始创办职业教育的历程。朱剑凡等在创立周南女校后,在其校内设立缝纫班和烹饪班,以培养社会实用人才。龙漳、谭延闿等参与设立工业与商业学堂,计划招收学生160人,其办学等级均为中学堂级别。1926年,两所学堂并入湖南大学。而徐特立等人则创办了长沙第一所平民学校,帮助穷苦学生学习基本文化知识,并开设手工业等职业教育科目,倡导手脑并用的实用主义精神。

3. 参与建设师范学校。师范教育是发展近代教育的重中之重,关系到各类学校的师资力量的充实和各级教育目标能否实现等关键问题。留日学生中,有相当部分东渡日本后学习师范教育,因此回到湖南后,大力倡导建立师范教育,除参与湖南师范馆(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建设外,亦大力参与西、中、南三路师范学堂师资建设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留日学生的杨昌济,在发展湖南师范教育思想方面做出较为特殊的贡献。杨昌济主张在教育学生时应注重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倡导以启发式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其独立人格。其思想对湖南师范教育发展影响较为深远,在其教导下,毛泽东、蔡和森等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影响湖南乃至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时代先驱。

### 三、湘籍留日学生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影响

综合看来,湘籍留日学生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湖南近代教育带来了积极影响:其一,促进了开放型教育在湖南的发展;其二,为湖南近代教育开辟了近代化的道路;其三,推动了湖南社会启蒙。

---

一是促进开放型教育在湖南的发展。近代教育的本质在于开放型教育的开展，用启发式教育代替传统的灌输式教育，以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湘籍留日学生作为从当时封闭的中国宗族社会分化出的群体，其内在意义就在于冲破传统教育和礼教的束缚，力图使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改造积弊重重的传统教育。在面对甲午中日战争战败这一惨痛的事实时，就更容易以强烈的变革意识去改变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变革意识和责任意识促使其利用留日学习的机会，对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归国后积极在湖南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式，在创办新式学堂时大力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精神，在思想和行动上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成为湖南近代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

二是为湖南近代教育开辟近代化道路。湘籍留日学生对西方和日本的强盛之道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其强盛的原因在于科学和理性精神已经深入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机理，甚至成为个人的生活指南，而这一切能够在西方和日本成为唯一的发展意识，根本就在于近代化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当他们回到湖南后，大力筹办各类新式学堂，以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新式人才；创新教育思想，提倡中西并举的教育模式，以“民主治校”“科学治校”为主要办学模式，注重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力图使学生可以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这些留日学生回湘后，为了更广泛地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促进全民关注新式教育的热潮，大量翻译西方和日本的书籍，兴办报刊，力图使新式教育思想能够深入人心，借此促动更大规模赴日和赴欧美的留学浪潮，以此壮大新式人才的队伍，力图快速改造社会和国家，使中国摆脱被列强欺辱的现状。在其影响和努力下，新式教育逐渐成为当时湖南教育的主流，湖南近代教育的现代化由此为始。

三是推动湖南社会的启蒙。社会启蒙作为人类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判断社会发展是否进入成熟和发达阶段的重要标志。近代湖南一直是传统思想与新思想交锋的地区，而在救国救亡思潮涌动下，湖南也适时做出表率，成为中国社会启蒙的先行省份，湘籍留日学生便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们认为，若是想推动社会启蒙，必先使教育成为启蒙的主要方式，留日学生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便是教育先行的范例，即以培养和提高国民的国家信仰和公民精神，来造就合格和健全的国民性。除此之外，妇女的解放也是社会启蒙的重要层面。

湘籍留日学生的参与对湖南的妇女解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文提到湖南派遣留日学生中，就有女性留日学生参与，她们回湘后，大力提倡新女性主义，要求解放女性，使妇女能同男性获得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范源濂于1904年回到湖南，倡议送女性去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并得到当时湖南官方的同意和支持，这一做法直接促进了湖南女性的留学日本热潮，至1911年，有13名留日女学生毕业，并成为湖南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如唐群英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同时，这场启蒙也较深地影响了湖南社会的其他方面，至1911年，湖南各县已设有师范学堂，使新式思想得以更深入传播；一大批影响中国的革命人物和先驱出现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成为领导中国走向独立与复兴的中坚力量。

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局限性。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首先，留日学生大多关注政治、法律、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忽视了其他科目学习，如经济和工业等。这直接导致了湖南近代学校教育中大多缺少经济学科的设置，如财经、商业等。特别是职业教育的筹办问题上，多直接与当时的湖南地方当局合作办理，这就容易受到封建旧势力的阻挠和破坏，造成其办学效果并不佳。

其次，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中途参与国内的政治运动而中断了学业，并没有完满学习近代日本的先进教育思想并用于湖南的近代教育，这就造成了一些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较混乱，影响了新式人才培养的效果。最后，湖南留日学生群体复杂，一些学生到日本后，虚度光阴，学无所成，但回国后充任各种新式教育机构的实际主持人，给当时的新式教育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并长期游离于实际之外，并没有起到改造社会和国家现实的作用。

## 四、结语

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进入衰落时期，正如时人张幼仪所说：“大家都认为这项悠久的考试制度太陈腐了，因此前些年就把它废除了。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学子都以公费（甚至私费）送往

日本、欧洲或美国，学习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日本所以也被当做西方国家，是因为它在 19、20 世纪之交打败了俄国。”<sup>[13] (p48)</sup>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传统教育已被社会主要阶级所厌弃，特别是对商人阶层或主张维新、革命的人群来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势在必行的。

而学习外国的先进教育制度，即开设新式学堂、厘定新的学制和教育政策是挽救中国教育甚至是民族危亡的最佳方式，出国留学必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宋教仁曾言：“清末留学之潮流，为我中国历史之大势，现学临邦（指日本）之长技，究其三十年富强之术，是我民族此日之责任。”<sup>[14] (p26)</sup>这句话中，既提到了留学之长处，亦讲出了留学日本的意义。当然，作为湘籍留日学生中的一员，宋教仁之语亦表现出了大多数湘籍留日学生的拳拳爱国之情，即完成振兴民族、挽救民族、开化民族的历史任务。

湘籍留日学生作为当时湖南首开风气的群体，其对湖南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历史局限性和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湘籍留日学生在救国救亡的感召下，毅然前往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同时还要受到当时国内旧势力的责难，但依然完成了建构湖南近代教育雏形的历史任务，其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为人先的勇气是令人钦佩和称赞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湘籍留日学生是湖南近代教育的先驱力量，其贡献远大于其历史局限性，正是由于他们不屈的开拓和反抗精神，才使湖南近代教育逐渐成为全国近代教育发展的缩影，为健全整个湖南近代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参考文献:

- [1] 戴季陶, 蒋百里. 日本人日本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2] (清) 张之洞. 劝学篇 [M]. 冯天瑜, 姜海龙,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3] 胡汉民. 胡汉民自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4] 张朋园. 湖南现代化的早期发展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 [5] 伍春辉. 近代湖南留日热潮与湖南新教育 [J]. 当代教育论坛, 2008/3.
- [6] 游学译编社. 游学译编 [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7] (日)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M]. 谭汝谦, 林启彦, 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83.
- [8] 刘象钦, 刘欣森, 周秋光. 湖南教育史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 [9] 陈学恂, 田正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 [10] 尚小明.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3.
- [11] 曾业英. 蔡松坡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12] 湖南学务处转饬筹办初小札文 [Z]. 长沙: 湖南省教育厅史志办藏.
- [13] (美) 张邦梅. 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 [M]. 谭家瑜,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

[14] 陈旭麓. 宋教仁集: 上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